

理论与方法

传播基础结构论

——世界各地人的‘新闻’概念

【美】帕米拉 J. 休梅克 (Pamela J. Shoemaker) 著 张咏华 陶 阳译

帕梅拉·休梅克博士是美国纽约 Syracuse 大学 S. I. Newhouse 公共传播学院的约翰·本·斯诺基金会教授、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传播学理论》杂志的主编、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新闻系主任。

休梅克教授是美国南俄亥俄州人。大学与硕士研究生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在传媒工作了数年又重返高校，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新闻学专业博士学位，1982 年获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其学术生涯，曾获美国杰出青年教师奖。

休梅克教授著述丰富，其撰写和参与撰写的著作 17 本，发表的论文约达 70 篇。代表性专著有《如何创建社会科学理论》、《促成传媒讯息的中介：关于传媒内容的影响因素的理论》、《传媒把关》等。代表性论文有《个人和传媒常规的力量在把关中的影响》、《异常行为、危险的事务以及美国的兴趣：世界事件的新闻价值》、《卷入媒介：选举信息的回忆 VS. 认可》等。

本论文是锡拉丘兹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约翰·本·斯诺 (John Ben Snow) 基金会教授科研经费资助的对十个国家所做的课题研究的部分内容。合作调研者为锡拉丘兹大学约翰·本·斯诺基金会教授帕米拉·J·休梅克 (Pamela J. Shoemaker) 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吉巴·科恩 (Akiba Cohen)。来自以下国家的学者们参与了数据的收集：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德国、约旦、印度、以色列、俄罗斯、南非和美国。

新闻。很少有其他概念如此为人所熟知又如此为人误解。它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质朴自明’的概念，也就是说人们似乎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在实际上却无法给它下定义。比如受众把‘新闻’理解为电视、广播新闻节目或报纸、某些杂志中的内容。记者们声称当他们看到新闻发生时知道那就是“新闻”。而新闻写作教科书列出了一系列使得人或事件更加具有新闻价值的条件，诸如新奇性或奇特性、显著性、冲突性或争议性、趣味性、重要性和冲击力或影响力、轰动效应、时效性或接近性。

对于受众和记者而言，这种认识新闻的方式是实用的。但对于学科理论的建设，这样具体的可操作性却于事无益。虽然“新闻”这一概念在无数研究课题中被使用，它却极少被加以定义。要更加全面地理解新闻在社会上以及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需要给“新闻”一词下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学者们、记者们和受众自认为自己知道“新闻”的意思是什么，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定义过它。霍尔(Hall, 1981)把“新闻”称做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而我的论点就是：“新闻”是如此的难以捉摸，以至于几乎是在藐视定义。

这里描述的研究提出，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两大类新闻，其一是异常的新闻，另一类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新闻。这两个维度与一则新闻报道在大众传媒的描述中占据怎样显著的位置是正相关的，并且两者是互动的。因而，如果一则新闻报道兼具了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它便会占据最显著的版面（休梅克 Shoemaker, 1996）。虽然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说对美国新闻报道来说是事实（休梅克，丹尼尔连及布兰德林格 Shoemaker, Danielian & Brendlinger, 1991），但对于别的国家与文化圈这一假说是否也能够成立？这就是本项研究所调查的。研究包括了对 10 个国家报纸、电视新闻及广播新闻节目的内容分析，外加对记者、受众成员及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焦点小组的访谈调查。

一、理论

“异常性”通常被定义为人的一种个性或行动、思想或事件使其本身显得与同类人、同类思想或同类事件不同。“异常性”可能被认为有正面的或负面的两种，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具有负面色彩，就像大多数新闻那样。当记者们运用异常性作为根本原因选取某事作为有新闻价值之事时，他们其实是正在运用新奇性、怪异性或者非寻常性、显著性、冲突性、争议性或者轰动效应这样的操作性指标。这种指标告诉我们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事情。

社会重要性是关乎社会体系的，无论这个社会体系是大到全球或者小到居民点。涉及社会重要性因素的新闻判断标准包括重要性、影响力、信息冲击力和趣味性。当记者们说他们的责任是教育公众，给予公众他们需要知道的信息时，这些新闻要素就在产生作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记者给予人们他们所想知道的信息时，他们就是应用了上述的异常性指标。给予人们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信息同社会责任理论有关，而给予人们所想要知道的信息则同市场有关，同吸引受众注意力的需要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广告商的需要相关联。

1. 异常性

人们常会注意那些异常的人、见解和事件。如军队入侵，又如人们可能会警觉到其孩子有可能变成毒品服用者，或者他们有可能会在工作的场所被批评指责，或者异常的政治见解可能会改变社会的性质。

这种倾向并不是新近出现的，而是根植于数百万年之前人类出现过程中。对于早期人类，注意环境，当危险出现时警告他人或者提请人们注意那些可能有助于人类的事物，这些都很实用。警告他人洞外有老虎使得我们的祖先得以避免受伤和死亡。找到并且向他人描述一种新的食物来源帮助了整个群体得以存活并欣欣向荣。

“异常性”的维度。异常性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著述中被给予了一系列不同方式的定义。规范性异常即大多数人听到异常一词时所想到的东西，因为规范性‘异常’即指违背规范和法律。罪犯是异常的，但那些不按照文化习俗穿着打扮的妇女同样是异常的。规范性异常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因为其关系项是法律及现存社会系统的规范。但是，在一个国家中违背法律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国家被视为一种正面的行为。

异常性的第二种维度同社会变迁相关联。某些社会体系的日常存在能够延续很长时间而在表面上不发生变动。但没有哪个社会体系对重大变动之可能性具有免疫力。实际上，时间长河里的某种社会变迁是在所难免的。新闻负载的信息可能改变现状的程度被归类于社会变迁异常性。意见观点、人或者事件都可能挑战现有的社会体系并触发革命或者政府的合法变动。全球传播体系给所有国家带来的文化信息可能会增加或者取代当地长期维系的生活方式。这种改变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本质上取决于视者的立场。从那些掌控现状却被颠覆的人的立场来看革命是消极的，但从挑战者的角度来看如果革命取得了胜利则是积极的。

第三种异常性的维度是统计学的，在这一维度上的异常即某种见解、人或事件与一般标准大为迥异，是不寻常的或新奇的。许多新闻符合这种类别，比如飞机坠毁、某人在一场标准性测试中成绩过高或过低、在一个干旱的沙漠地区出现大量降雨等等。

全球的新闻形式深深地受到两种形式的进化的影响——生物的和文化的。人们受生物上的影响而专注于异常性，受文化的影响而专注于社会重要性。异常性作为新闻的一个部分，其基础来自生物进化。

关注某些见解、人物和事件是一种认知行为，而认知理论本身也必须从生物学出发。从人脑进化形成的方式出发，进化心理学提出人脑进化与人体进化有着相同的方式（马拉姆斯、海维与林兹 Malamuth, Heavey & Linz, 1993）。克斯麦德和突彼（Cosmides and Tooby）认为心理学是生物进化影响社会行为的机制。那些解决特殊问题和躲避食肉动物等的认知程序（比如躲避食肉动物）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运算法则”，它们可能导致模式或构架的建构。

有关“认知”和“大脑”的理论讨论中，电器科学的隐喻已经理论化地充斥其间。朗（Lang）将生物和社会学习同环境反应理论结合起来。刺激与反应间的某些联系是大脑里的“稳定网络”。辛格（Singer, 1980）说人脑“是联上网的”，以自动地对于外界环境中发生的意料不到的事件做出反应。克斯麦德和突彼认为那些指导行为的心理程序是在某种神经中枢硬件中的。休梅克（Shoemaker, 1996）提出生物进化已经导致了人类的硬联网以便获取新闻。

生物进化的最早的清晰理论见诸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其最大贡献是对于进化究竟怎样发生给出了一种似乎有理性的解释：所有的有机体进行繁殖，一个物种里的个体有细微不同，且所有的有机体为了生存而竞争。当环境发生改变或者一种新的生物遭遇一种既成生物时，最能适应新环境的有机体将会逐渐繁殖得比那种适应新环境较差的有机体快。有机体之间的变动或者环境的变迁因而将会给某一物种的某些成员一种再繁殖的优势。

适应性有助于使得一种生物体比同类的其他生物体更加适合生存和繁殖。简而言之，如果个体表现出可适应性特征，那么该人的基因在后代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一点就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并且“这一特征将会变成整个物种的共性特征”，这一点也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威尔森 Wilson, 1978）。虽然某些特定的基因已被证明引起了某些疾病，比如，某些社会行为的产生更像是由于基因的结合而导致的，其中某些基因停止了动作，而还有一些则运转如常。随着对人类基因组认识的增加，我们将能更好地为社会行为找到遗传学上的解释。目前对于基因结构有日新月异发现，其中许多改变了人们原来所知。但基因的特征以何种确切的方式相互作用仍未知晓。

环境监测的功能、新闻的采集与传播本应该颇适合于早期人类。较之同类中的其他人，那些会警惕食肉动物的人就更可能生存和繁殖。无论是因为饮食、地理、自然灾害还是基因突变，早期人类一定曾显示过许多不同。同样地，有些人对监测环境兴趣更大或更善于这么做。跨越了数百万年，监测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在人类的全体成员中会获得呈现，这可能可以解释某些人类学家所说的“文

化普遍特征,例如 恐惧、生气、沮丧和满意的情感'存在的原因(肯迪 Kemper, 1987)在早期人类当中,恐惧和气愤可能曾经相互作用,从而刺激监测机制,因为“当面对外来的危险和威胁时”这些情感'会激励生物为达到生存目的而采取急迫行动”。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威尔金和帕特森 (Wilkins and Patterson, 1987) 曾经提出,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最好的新闻报道便是其他某个人的灾难。受众中流行的观点也强化了这一点:媒体喜欢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并且新闻中确实是充斥了丑闻、冲突、犯罪和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此类事件感兴趣。尽管偶尔的也有要求好消息的呼声,但实际上人们对好消息注意得较少。

研究人们如何注意事物的心理学家们发现,新颖的事物似乎比常规的事物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诺尔森 Nelson, 1989) 而且人们会把注意力放在新颖或不寻常的事上,只要这些事不同于人们的心理图式(若威·科利尔 Rovee-Collier, 1989)。另外,接触大量并非在心理图式之中的信息会引起人的惊异或畏惧(辛格 Singer, 1980)

因为坏消息通常也就是关于异常性的消息,而异常的事物比起常规事物来要求更多的认知处理(纽哈根、瑞维斯 Newhagen & Reeves, 1992),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信息尤其是异常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对人类变得如此重要?人们对坏消息或异常的新闻投入较多的注意力,正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有益。当人们监测周围环境并且思考异常的刺激信息时,他们也就增加了自身适应环境以便抵消或减少对现状所存威胁的可能性(纽哈根、瑞维斯 Newhagen & Reeves, 1992, Newell, 1990)。当面临异常的和非常负面的形象时,情感就可能被触发从而帮助我们在遭遇到危险处境时表现良好(朗 Lang, 1985)。

2. 社会的重要性

尽管异常性似乎决定了众多的新闻(休梅克、丹尼尔、布兰德林格 Shoemaker, Danielian, & Brendlinger, 1991), 但很明显新闻概念还有另外的一面。随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注意某些事情而不是另外一些事情,他们形成了如下倾向:无论在个人或公众层面上,他们都关注那些会影响到他们生活的事情。凯锐 (Carey) 将重大的新闻描述成是“必须被阅读的符号 较大事物的迹象 应被重视并被记取的事件 文明状况的特殊证明 或者我们遭遇的危险或我们曾经拥有过的辉煌”。之前的研究已经区分了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重要性,认为这三个维度解释了事件对于某一特定文化或社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休梅克、丹尼尔、布兰德林格 Shoemaker,

Danielian, & Brendlinger, 1992)。政治重要性指的是新闻内容对人民与政府之间或者政府之间关系的潜在或现实的影响程度，政府机构包括司法的、立法的和执法的子系统。经济重要性指的是新闻内容对商品和服务交换潜在的或现实的影响程度 这种服务包括货币体系、商业、关税、劳动、运输、人才市场、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重要性被定义为新闻内容对社会体系的传统、体制惯例和规范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影响程度 比如宗教、种族或艺术。第四个维度是公共重要性，它指的是提高或危及一则新闻所代表的公众福利。通常，我们认定一则新闻所影响到的人越多，该新闻对公众福利就越具有重要性，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基于这些定义，我们认为在所有四个社会重要性维度中得分高的一则新闻在特定文化中应比起社会重要性得分较低的新闻占据更多的新闻篇幅。要注意社会重要性被判定的语境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公众福利思想、人及事件出现所处的地理单元。有些事情在一个国家或文化中具有极大的社会重要性，却可能在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中毫无重要性。

文化的演化。如果人类对异常新闻的关注不是与生俱有的和源自生物上的，那么新闻消费习惯就必定是后天习得的。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教导，监测环境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在过马路之前先看两边）。我们被教导去注意周围的世界并参与对有关既存威胁和潜在利益的信息认知过程。尤其是当关系到异常事件或者坏消息时，识别异常的人（“远离陌生人”）、事件（“不要使用毒品”）以及思想（“谁告诉你那样的？”）不仅对维持现状有功用，而且对牵涉其中的个人安全也是具有功用的。我们知道了什么能伤害我们。我们知道了根据我们的文化准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所强调的、值得注意的。

文化被下了不同的定义，被定义为“包含各个种类的至少稍微经过组织的信息的一个集合体、这些信息在社会内部及跨越了各代人传递”（巴扣 Barkow, 1989）并且被定义为“社会成员分享的可用社会生活方式学得的知识体系”（卢斯登 Lumsden, 1989）。正如文迪杰克 Van Dijk, 1988 所指出的，这样的社会学习提供了我们惯常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当牵涉到异常性时，我们的文化就会教给我们关于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以及他们应受到的惩罚以及关于什么样的异常行为或思想需要注意。

文化是某种我们彼此学习的东西。当代代相教时，每一代都可能通过非遗传学的方式继承其祖先的知识、态度及行为。学得的材料架构成了文化遗产。这种看法强调社会学习而不是生物进化，是文化的基础（罗格斯 Rogers, 1988）。一 种

关于为什么人会注意新闻的社会学习论的解释，认为诸如监测环境之类的社会行为是通过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后天习得。关于对自身和环境特定威胁的信息是社会性的被获知的，按照这种理论这是惯常环境监测的需要。

文化是任何在遗传基因影响开启之后，作为相互联系地认知陈述的系列被习得的。在大多数的习得理论中，对于社会行为习得的生物影响是不被考虑在内的。

3. 生物进化和文化演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正如以上所解释的，人类中强有力的监测行为的发展至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人类对于新闻的兴趣可能有生物的根源。在新闻采集和散播中固有的生殖 / 复制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基因遗传上倾向于调查和报道周围环境正在发生的新情况。我们对于新闻着迷的另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原因就是文化：在许多社会中，人们从童年时代就被灌输应该注意自己周围的世界。老师就时事进行测试，家长与孩子们讨论政治和世界大事。在美国，一种隐晦的假设就是关注新闻将有助于民主，监测异常政治见解比提防老虎更重要的。

生物学和文化学解释之间重要区别就在于生物学的论证假定人类生来就有注意新闻内容的倾向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文化学的解释则认为人关注新闻的倾向性是能够后天习得的，并且它是个人适应社区或国家的整个社会化过程的一种功能体现。具体应关注什么新闻，这一决定的做出更可能是由文化所决定的。

所以，人类对于监测环境和使新闻强调异常及社会重要性的倾向究竟更多的是基因进化的功能使然还是由于文化社会化造成的？最好的回答几乎可以确定是二者相互作用。我们的基因遗传给予了我们去看和听这个物质世界的仅仅一小部分的能力，但文化进一步限定了我们所关注的现象。“眼前的行为不是‘天性对后天’的产物，而是‘天然与后天相互作用’的结果”（马拉姆斯 海维与林兹 Malamuth, Heavey & Linz, 1993）。

很明显，我们是生物学上的存在物，我们出生、成长、繁育并老死。罗帕锐特（Lopreato, 1984）把人的本质定义为“基于基因遗传的行为倾向，它们的形成是由于自然选择，而这种选择至少部分的是在社会文化演化之下发生的”。新生的孩子不是一块空白的只被文化书写其上的石板，而确切地说是通过他的基因承继，被设有以特定的方式展开举止行为的潜力的程序的，通过文化社会化，这些潜力或者被激发或者被压抑。文化能决定哪些曲调被演奏或者是否有任何曲调被演奏，但它不能将钢琴变成长喇叭。

这种相互作用的提议认为，除非“基因构成的神经系统电路图允许来自一个感官的信息同来自几个或所有感官的信息相联系，否则文化概念对一个人来说无法存在”（汉德沃克 Handwerker, 1989）。然而基因并不决定结构的内容。每个人都是由基因继承和文化环境双双塑造的。

如果文化对于社会行为的作用没有被考虑进去，那么所产生的理论可能就会无可非议地被指责为“基因决定论”（盖格 Geiger, 1990）。同样地，如果对于社会行为的生物上的贡献没有被考虑进去，那么所产生的理论代表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可能就会被形容为“文化决定论”。如果跨越文化，我们倾向于看到相同社会行为的发生，那么这可能是社会行为的基因传输的证明。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如果在各文化之间社会行为与重要的方式互不相同，那么这可能就是行为的文化传播的证明。对新闻的兴趣可能是这两种纯粹模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人们既对异常的事情有着与生俱有的兴趣，又由于社会化而关注对其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具有重要性的事件。

二、方法

本次研究包括了在以下每个国家的两个城市内所做的焦点小组访谈和内容分析：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德国、约旦、印度、以色列、俄罗斯、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被有目的地选择来代表所有的大洲，代表不同的文化、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这些国家包括了大国和小国。虽然这十个国家显然并不能反映世界各国的随机抽样样本，但它们颇能代表全球新闻体系的多样性。因而我们并不宣称有能力对整个世界进行概括，却宁愿声称能够对各类型国家间的不同之处有所阐述。

各个国家的学者们承包了所有的数据搜集工作，与各国的原住民充当的研究助手一起工作，其目的是确保文化语境得以保持。虽然学者们是由两个共同的调研者进行培训的，并且被给予了用英语写就的标准化培训材料，但研究材料的翻译而且对于如何给内容编码打分的解释则由他们自己酌定，我们故意让这一点受到文化的影响。

1. 内容分析

在每个国家中选择哪两个城市是由身处这些国家的学者决定的，他们主要根据以下的指示：选择最大的或者最重要的城市，并选择一个比之小得多的城市。在每个城市中，这些学者也选择处于领先地位的报纸、电视新闻节目和广播新闻节目来做内容分析。因而本次研究分析了 20 种报纸、20 种电视新闻节目和 20 种

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段确定为构造的一周(七周时间中每周的一天)从2000年后期开始 所有的内容都被加以分析 包括广告。

被编码打分的变项包括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的类型、报道的主题和报道是怎样被突出地描述的。

2. 焦点小组

在所有20个研究城市中,我们在每个城市对四个焦点小组进行了访谈调查,即共有80个焦点小组。这四个焦点小组的类型被定义为:记者和编辑、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社会和经济地位高的受众成员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的受众。对少量的常见问题提供了一般指导。

此外,最后的练习要求参与者给取自他们当地报纸新近几期的新闻报道排序。这些报道是按照它们在报纸上所占据篇幅的地位入选的——从顶级报道(其新闻价值在90%上下浮动)到具有最少新闻价值的报道。照此方式十则报道被从三个分开的日期中挑选出来并被作为不同的三套报道介绍给参与者。参与者被要求在每套中对新闻报道进行排序——从他们认为最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依次排到最没有新闻价值的报道。

三、结果

在内容分析中对超过32000条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此次研究在下述这一点上是不寻常的:报纸上所有非广告内容均被分析,包括气象、股票价格、星座和连环漫画。报纸内容分析的结果可能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这些内容的大多数并不全在传统的新闻定义之内。

1. 内容分析

当所有研究国家的数据被结合到一起时,在世界各地体育类报道占据了新闻主题的第一位,14%的新闻报道是关于体育的。这就反映了体育新闻通常在新闻媒介中占据常规位置的事实。很少有别的主题如体育一般常规地被报道。其他报道最多的新闻主题是国内政治(13%);文化事件(11%);商业、贸易和工业(9%);国际政治(8%);国内秩序(7%)和人情味(6%)。包括体育在内,这七种主题占据了全球新闻的2/3。

在这些主题中,体育、政治、国内的和国际的及国内秩序最有可能包含了异常性。体育新闻通常以身体冲撞和争议的形式带有异常性。体育播音员和记者

提请人们注意运动员发生冲突的情况和规则实施中引起争议的情况。历史上，武士们进行体育竞赛，将之作为战斗的间隔中磨炼技能的一种途径。这种制度化了的身体搏击是区分最强壮者、速度最快者和最有技能者，并鉴别佼佼者的一种方式。今天，体育领头者们除了因为身体技能而赢得声誉外，还通常被作为娱乐界和广告界的明星来对待。体育明星过着极好的生活，通常能赚取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大把钞票，并且在电影和电视明星及其他富人活动的社交圈里也同样受到追求。有些体育项目比其他运动更为风靡，当然，那些要求最剧烈的身体冲撞的运动吸引最多的注意力，比如足球运动。射箭之类的奥林匹克运动也要求具备身体技能，还有领头者之间的竞争也会被电视播音员作为冲突宣传。但是它们只是每四年一度在新闻中大量报道，这一事实反映了运动已经不再与现实的战争有关。

比起体育来，政治则是社会冲突的一种形式。选举制度是识别政府领导者的一种制度化方式，并且本身是常规冲突的一种形式——一人会取胜，他者失败。选举之前和之后，新闻媒体都习惯性地强调随着候选人为谋职位玩弄手段而出现的冲突和争议，这些候选人或因此丧失或赢得选民的支持。即使重要的政府职位已经被任命，也常会有新闻报道各种不同人员得到该工作的可能性。新闻媒体的工作就是在冲突和争议存在的地方发现它们，而它们往往就存在于政治之中。

有关国内秩序的新闻典型地牵涉到违背法律和规范以及社会对这些行为的反应。新的法令可能被颁布，警察可能会严厉制裁某种类型的罪犯，或者宗教机构可能改变他们对于宗教信徒之间冲突作出反应的政策。

政治和国内秩序的新闻报道可能包括社会重要性的因素，当然，就像商业和人情味新闻报道可能包括异常性因素一样。这两个维度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许多报道可能同时包含了两种因素。

国内新闻主题。并不是每个国家都遵循这种一般模式。在约旦，国际政治是最重要的新闻主题，而在中国，体育在最重要新闻主题中处于第十位。相较而言，体育在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和美国是新闻的主要话题。国内政治在智利、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最重要的新闻主题，在德国最重要的新闻主题则是文化事件。然而即使具备这些不同，这十个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所有新闻的大约一半：仍然是关于体育、国内政治、文化事件、商业和国际政治的。

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研究中对新闻所体现出来的异常性的量进行了估价。结果显示，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所有传媒在它们的新闻中包含了最多的异常性，而以色列和美国传媒新闻中包含的异常性最少。报纸包含的异常信息最少，而电视

和广播新闻包含的最多。这可能是由于如下事实：报纸含带了许多非新闻的内容而且报纸负载了大量报道，而电视和广播节目所能包含的报道的数量则受到时间限制。当只有少量的事件可被选取时，异常的人物、事件和见解就最容易被选中。研究也显示了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可能青睐于强调异常新闻。

研究中也对新闻报道所具有的社会重要性进行了估价。澳大利亚、中国、德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新闻媒体登载的报道最具社会重要性 而以色列、约旦和美国新闻报道所携带的社会重要性最少。电视和广播比起报纸来发表更多的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新闻。小城市比大城市更强调社会重要性。

显著性。研究中观察了异常性或社会重要性与新闻媒体如何显著地表述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察揭示了一种有所不同的模式。比如，虽然中国的新闻中包括了许多的异常信息，但除了中国电视新闻的视觉内容外，一则新闻报道的异常性并不能预示它将占据怎样显著的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新闻报道中含量较低，但这些具有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的报道确实看来占据了较显著的地位。此外，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能更好地显示一则报道在电视和广播新闻中的显著地位，相对于报纸而言。

2. 焦点小组新闻评估练习

所有焦点小组的调查都以这一练习结束。练习内容是要求参加者对其地方报纸中的新闻报道进行排序——从最具新闻价值的到最不具新闻价值的。受众成员小组、记者小组和公众关系从业人员小组对此的排序被彼此作了比较，这些排序同这些报道在报纸中的显著性排序之间也被作了比较。在每个国家，所有的人在新闻价值排序上彼此间都是高度一致的：受众成员与记者和公众关系从业人员意见一致，记者又同公众关系从业人员意见一致。但是，这些焦点小组与报纸之间的一致性则低得多。这就表明人们并没有真正从他们的报纸上获知他们想要的东西；即使新闻工作者也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报纸的报道新闻的方式。

四、结论

这项十个国家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新闻是怎样被定义的。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是，在世界上，新闻价值部分地由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来界定。具备这些特征的人、见解和事件应该最可能成为新闻。

虽然学术界尚需开展更多的分析，但此处描述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所有十个

国家的新闻中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虽然报纸看起来包括具有这些特征的内容的可能性最小，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决定在研究中包括报纸上除了广告以外的所有内容。由于许多报纸包括那些不能被归类为硬新闻或软新闻甚或观点的内容 这些连环画、填字游戏、星座等等 代表着并不能真正称得上报纸组成部分的内容。看来报纸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报纸的新闻、观点和特写；第二，这些别的材料它们可能最好是被定义为一种娱乐形式。

大众传播研究的很大部分是寻找不同：人们媒体使用习惯的不同，各类媒体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的不同以及各类媒体在如何所报道事件中的不同。但本次研究更倾向于观察共同特征：新闻媒体和人们在定义新闻中的共性。在所有十个研究的国家中 新闻报道的 $2/3$ 仅只是关涉七种主题的。异常性和社会重要性在所有十个国家的新闻媒体中都出现。所有十个国家的人们就“什么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的观点高度一致 胜于他们同其报纸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性。

虽然我们强调全球各国间的差别，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各国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点。总体概括来说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人就是人 而新闻就是新闻。

（译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新经济制度的传播观

陈卫星

一、市场机制的双向互动

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迁——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造——意识形态的重构。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主要由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决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强势集团；决定社会力量对比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充满了国家、行业、地方、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其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共识：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开放市场，进而建成体制转轨。一方面，国家意志是市场的动力，而另一方面是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导作用。而国家意识形态也不再是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和不同的组织层面，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某一权力体制庇护下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市场力量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源流，代表着不同的‘民间资本’的利益诉求。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打破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市场的经济效率诉求，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分配的互动。每个市场主体在独立扮演经济角色的同时，又不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对外的资源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各个市场主体之间既有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也有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中国社会转型，直接改变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国家计划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形成了利益相对独立的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经济改革是在经济组织的布局上进行区域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的途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呼唤在成为时代要求的同时，又产生着新的社会张力和社会流动。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政策之争已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是利益立场的倾向之争。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能够照顾大多数人利益、可以皆大欢喜的方案早已用尽。社会再挪动一步，必然会有益于某部分人利益而损害其他人利益；即便是呆在原地不动，同样也会有人欢喜有人愁。因此，每一点利益都有博弈，每一个政策都有倾斜。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传播是新的社会整合的形式，这在象征层面上允许个人和集体有更高的自治，解放了自发性，使得自发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如果经济基础发生了嬗变，上层建筑和社会表象就处在一个不断调整的状态当中，人的秩序和事物的秩序就会出现断裂而需要缝合。如果说经济改革在概念上带来了经济理性，而在社会的表象领域，要保证一个社会行动能够产生最大的可理解性，那么就要提供现实的证据、可能的知识、人和事物的动力和阻力。总之，就是理解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事实上，一个社会好比一个自我组织系统，要能够承受噪音、新奇、环境中的偶然事件，这样便可增加它的异质性、多样性、自治性，前提是不超出它的发生机制的限制。相关的知识结构形成信息处理机制，最后成为新的可行性方案。

二、传播意志与利益博弈

主体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个性化的表象，市场经济首先把主体定义为一个生产者，引导生产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合同行为、契约意识、个人能动性和所有制多元化成为新的社会表象。这就是说，经济改革为新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创造了新的空间，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新的社会表象的基础上，跳跃出新的社会动力结构。哈贝马斯说：“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概念。”^①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成本的制约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和开发有限的信息资源，从而在有效供给、校正偏差、实现效率方面使得市场机制成为制度设计和选择时的最优选择。新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成分，经济结构的变化所要求的制度创新是重新建构市场、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网络，不仅涉及经济和政治，也与社会、心理有关。因为在这个历史性变化过程中，身份意识、认同意识、环境意识、他人意识都在社会运动中发生嬗变。而从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传播活动的本质是趋向于一种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传播本身表达了一种双重逻辑，既是互动反应，又是互动反应的表现。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互动反应，因为一种媒介化的互动反应是通过争

^① Jurgen HABERMAS, *La pensée postmetaphysique*. Armand Colin, Paris, 1993. 83

鸣来完成 这假定了自在意识 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表现 因为这不是一种自言自语 而是主体间性 要求一种双方的理解。

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能够包容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按诺斯的说法,制度的功能在于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当一种制度结构能对‘生产性努力’形成激励时,亦即经济人的收入增加与其所付出的边际生产性努力对全社会的边际贡献成正比时,经济增长就具备可能性,社会进步也才能成为现实。但是,在物质利益结构之外的象征因素也对激励结构的持续产生维持循环的作用。袁方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经济的制度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但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则需要新的支撑,这就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利益在组织层次完成新的整合。在经济变动过程中,只有与社会变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撑,只有建立在不同利益之上的‘阶层意识’才能有效地抑制放纵个人利益的‘搭便车’行为 只有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新的秩序。”^①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分配机制多元化的形成 使得以经济利益为维度的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 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 甚至社会断裂。同时 社会关系的连接纽带在增加 社会关系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而传播手段和沟通方式在调解社会关系当中也越来越重要 并在一定情况下 产生社会性的信息补偿或心理释放。

纵观历史,政策博弈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民主开放的社会,政策法令的形成,必先经过社会充分的酝酿,历经规范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样的政令,难于形成 难于被政府左右 但一旦形成 则易于被社会接受 易于贯彻落实。另一种是高度集中的社会 政令形成于上 只有当其贯彻下来时 才会遭遇社会的反弹。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政令变形走样,或者在或明或暗中 做出妥协、修改和变通 形成各种形形色色的“路径依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社会结构不仅仅是组织机构和体制约束,也包括传播方式和信息手段。一个政策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形势的直接产品,因为这种形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根据社会行为主体的认识栅格来表达和编码的,具体来说,是根据支配性阶层和受支配阶层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相反,一个政策绝不可能超越一定社会关系的限制,而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处

袁 方 等.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18 页